

能人型村干部如何影响村庄新内源式发展： 基于全国性村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韩旭东^{1,2}, 郑风田³, 郑淋议⁴

(1.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北京 100084; 2.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4;
3.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北京 100872; 4.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 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村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能人型村干部对村庄新内源式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 具有个体户经历的村书记能够显著提升村庄总收入, 具有企业老板经历的村书记对村庄总收入和集体资产收益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从影响机制看, 具有从商经历的村书记更容易获得政府项目支持以及更能促进农村电商发展, 从“外发促内生”与“内联促外引”两方面助推村庄新内源式发展。从异质性看, 在实行“一肩挑”制度的村庄, 能人型村干部对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再显著; 宗族这种非正式制度限制了能人型村干部对村庄收入的促进作用。从政策导向看, 要多措并举激励能人返乡, 为其创业创新提供切实保障, 同时要强化村两委班子建设以及完善基层治理制度。

关键词: 能人型村干部; 新内源式发展; 从商经历;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F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566(2023)06-0056-10

How do capable village cadres influence the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villages: An analysis based on nationwide village panel data

HAN Xudong^{1,2}, ZHENG Fengtian³, ZHENG Linyi⁴

(1. China Institute for Rural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3.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4. China Academy for Rural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capable village cadres on the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using representative village panel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village secretary with self-employed experience can increase the total income of the village, and the village secretary with enterprise boss experience can increase the total income of the village and the earnings of collective assets. Furthermore, capable village cadres can conveniently obtain government project support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thus promoting the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village. Howev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apable village cadres on the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no longer significant in the villages carrying out the “one shoulder carrying” system; The informal system of clan restricts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capable village cadres on village income. So, multiple measures and solid guarantees should be taken

收稿日期: 2022-10-14 修回日期: 2023-05-12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从‘公地悲剧’到‘公地喜剧’: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如何影响集体经济发展”(2022M711773)。

作者简介: 韩旭东(1993—), 男, 甘肃通渭人,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信作者: 郑淋议。

to encourage talented people to return home and start business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village committe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

Key words: capable village cadres;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enterprise experie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是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依托外来资源激活村庄沉睡资源,焕发村庄发展活力是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与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1]。在村庄内部资源不断流出和外来资源大量进入的情况下,如何利用好内源力量和外源力量以推进乡村振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亟待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发源于20世纪末的新内源式发展理念为我国乡村振兴提供了“第三条道路”^[2],新内源式发展重视内部与外部力量的整合,以地方参与和地方资源为前提,承认并接纳超地方因素在村庄发展中的作用,通过乡村内部主体与外部主体的互动、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的融合,实现“外发促内生”与“内联促外引”的有机结合,进而推动村庄内生发展^[3]。

在实践上,新内源式发展理念认为乡村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能够调动内部资源与应对外部力量的当地机构^[4]。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度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引进一批人才,有序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让其留得下、能创业”。《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指出,“要注重从本村致富能手、外出务工经商返乡人员、本乡本土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中的党员里培养选拔村党组织书记”。国家政策吸纳使具有企业家经历的经济能人进入村庄权力中心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本文将具有从商经历的村干部视为能人型村干部,在以发展为导向的农村社会环境中,能人型村干部以企业化方式整合内外部分散资源实现对村庄沉睡资源的有效开发,促进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其已成为推动村庄新内源式发展的核心力量。

回顾已有相关文献,尽管部分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能人型村干部对村庄发展的重要作用,但相关研究以案例分析为主,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所用数据也为截面数据,不可避免地存在内生性问

题。鉴于此,本文将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村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能人型村干部对村庄新内源式发展的影响及用机理,以及进一步探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条件下能人型村干部的异质性影响,以期在丰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厘清“乡村人才”与“乡村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为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与推动乡村振兴提供经验参考。

一、文献综述

(一)村庄新内源式发展理念形成

传统农村发展模式建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上,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由外来企业或政府援助进行社区开发,即外源式发展(exogenous development)理念。这个理念强调乡村依附于城市经济系统,依靠外部条件的注入,推动农业产业化和专业化,主要做法是引进新技术、吸引产业进入乡村,自上而下地改善乡村结构^[5]。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外源式发展模式给乡村经济、文化和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性影响,学者在对传统发展理念进行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内源式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理念。这个理念是一种“自我导向式”的发展,以当地人为主体,培养地方基于内部的生长能力,同时保持和维护本地的生态环境及文化传统。

早期内源式发展理念打破了自由资本主义营造的幻象,但却落入了“桃花源”式的理想主义困境,在过于强调内部力量的过程中,“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间的裂痕逐步扩大。农村作为一个经济、文化、政治的综合性社会系统,关键问题在于乡村如何将外部资源为己所用的同时保持乡村的差异性和农民的主体地位^[6]。20世纪90年代,一种强调统合乡村发展内外部力量的新内源式发展(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成为乡村发展的“第三条道路”^[2]。新内源式发展理念将农村发展置于整体的、互联的、动态的视角下,将农村功能的定位从以往的依附、输出角色转变为城乡相互

依存体,重视乡村多样式发展,希望建设具有独特性、本土化的乡村社区^[4]。

(二)中国乡村新内源式发展

中国乡村发展也经历了从注重外界对乡村的资源输入到强调以激活乡村内部动力为核心,再到强调“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双向发力的过程。政府、市场和社会资源等外部力量不断注入乡村,成为乡村振兴强劲的外源性动力。但新内源式发展的持续性动力源自何处,产生于何种条件以及如何维持和自我复制,还处于“黑箱”之中。岳晓文旭等^[7]指出中国乡村振兴中新内源式发展的基本路径是赋权增能,能人作为组织的发起者与管理者,以资源优势带动组织发展,在更大范围内整合内外部资源,从而推进乡村发展。

在实践中,任何一项集体行动,都离不开能人的领导和带动^[8],在中国这一威权体制型国家更是如此。在村庄新内源式发展中,能人带动是必要且有效的。从必要性来看,能人扮演着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和制度演进的推动者双重角色。充足的精英或者人才支持,不仅能科学有效地规划乡村发展的内容和方向,还能拓宽发展渠道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从有效性来看,能人在村庄生活中发挥着领导、管理、决策及整合的功能,具有示范引导、组织动员的作用,凭借自身资源优势为维护乡村秩序、建设乡村作出贡献。

具有从商经历的能人型村干部主政村庄后,将企业经营理念与营运方式运用于村庄经营,对村集体资源进行市场化与企业化运作,实现村庄的自我增值和自我发展。已有对村干部个体特征的实证研究表明,村干部经营管理经验能够显著提高农户收入^[9],具有从商经历的村干部能够通过提供外出就业机会、发展本村企业等促进村庄发展^[10]。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能人型村干部通过从商经历获得的管理经验与社会资本可以作用于村庄新内源式发展,但其促进新内源式发展的“强度”与路径有待深入分析。

二、研究假说

(一)假说提出

村庄富不富,关键看干部。火车跑得快,全靠

车头带。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对人力资本、创新和知识的投资。具有从商经历的个体具有突出企业家才能,而企业家才能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能够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为简化分析,假设具有从商经历的能人型村干部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对其企业家才能赋值为 1;没有从商经历的一般型村干部人力资本相对较低,对其企业家才能赋值为 0。通过将企业家才能引入生产函数,构建内生增长模型。选择 C-D 生产函数,分别用 L_t 和 K_t 表示劳动和资本投入, α 和 β 分别为劳动和资本产出弹性,企业家才能系数为 λ ,其作用于人力资本存量,则一般型村干部生产函数为:

$$y_0 = A L_t^\alpha K_t^\beta$$

能人型村干部生产函数为:

$$y_1 = A [(1 + \lambda) L_t]^\alpha K_t^\beta$$

$$\text{s. t. } \lambda > 0$$

式中, y_1 和 y_0 分别为具有企业家才能和不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两类个体的产出水平。假设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即 $\alpha + \beta = 1$,则个体收入等于其劳动边际收益,并通过收入水平衡量其产出绩效,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个体产出绩效为:

$$I_1 = \frac{\partial y_1}{\partial L_t} = \alpha A (1 + \lambda)^\alpha L_t^{\alpha-1} K_t^\beta$$

不具有企业家才能个体的产出绩效为:

$$I_0 = \frac{\partial y_0}{\partial L_t} = \alpha A L_t^{\alpha-1} K_t^\beta$$

由此,企业家才能对产出的贡献效应 C 通过相对数值表示为:

$$C = \frac{I_1}{I_0} = \frac{\alpha A (1 + \lambda)^\alpha L_t^{\alpha-1} K_t^\beta}{\alpha A L_t^{\alpha-1} K_t^\beta} = (1 + \lambda)^\alpha = (1 + \lambda)^{1-\beta}$$

当 $\lambda > 0$ 时,可得 $C > 1$ 。在此基础上,对企业家才能求偏导可得:

$$k = \frac{\partial C}{\partial \lambda} = \frac{\partial (1 + \lambda)^{1-\beta}}{\partial \lambda} = \frac{1 - \beta}{(1 + \lambda)^\beta} > 0$$

式中, k 为企业家才能对经济绩效的贡献系数。结果表明,个体企业家才能与其经济产出正相关,即较高的企业家才能能够显著促进经济效

益提升。村干部从商经历对村庄经济发展有以下几方面影响:首先,从商经历为个体创造了发现新机会的认知路径,帮助村干部克服创新经营面临的不利因素,积极规避风险,促进村庄发展;其次,有从商经历的个体积累了丰富的市场经验、经营管理能力,也更具收集信息和规划投资项目的能力,这些知识能够增强其整合资源的能力;最后,从商过程中形成的社会连带为创业者带来了广泛的社会和商业网络资源,能够在与他人合作过程中获取创新产出,以此提升经济效益。

综上所述,村干部从商经历代表了突出的人力资本与宝贵的资源,通过提高机会识别、增强组织管理能力与建立良好社会网络等创新村庄经营模式,带动村庄新内源式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H1: 相较一般型村干部,能人型村干部对村庄新内源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二) 影响机制

乡村振兴需要“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双向发力,对应村庄新内源式发展的“外引”与“内联”两大机制。

“外引”的目的是“外发促内生”。懂经营、会管理的能人型村干部能够有效甄别村庄发展所需资源,积极向上争取帮扶。地方政府也乐意将资源集中投向经济条件较好、发展能力强的示范村和典型村。而且,能人型村干部在村庄内部具有较高的威望,能够整合村庄资源,增强村庄的凝聚力,在利用政府资源时更有可能作出成绩和产生影响,能够成为基层政府工作的“亮点”,为进一步获得政府支持打下基础,多方资源集中到村庄自然能够促进村庄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H2: 能人型村干部有助于使其所在村庄获得更多政府支持,以此进一步促进村庄新内源式发展。

“内联”的目的是“内联促外引”。能人型村干部的企业家精神能够带动对村庄创新发展,尤其是提高村庄创业活力。电子商务作为草根创业活动,是农村经营创新的重要表现。能人型村干部

能够为村庄电商发展提供基础性条件,促进电商企业下乡,进而促进农户创业,其也可以发挥榜样带动作用,成为农户效仿的对象。电子商务有助于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衔接,促进村庄产业形成与集聚,进而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H3: 能人型村干部有助于推动其所在村庄电商发展,以此进一步促进村庄新内源式发展。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China Rural Household Panel Survey)三期社区面板数据。这个项目调查方案采用了分层、三阶段与规模度量成比例(PPS)的抽样设计。其中,第一阶段按照人均GDP将全国市县分成10层,分层随机抽取样本县(区、县级市);第二阶段从抽中县(区、县级市)中随机抽取社区(村);第三阶段在抽中社区(村)中随机抽取住户。调查数据涵盖全国除新疆、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外的29个省份,具有农村、城镇、省级和全国等多个层面的代表性。本文聚焦农村社区,保留了村干部个体特征、村庄治理特征以及村庄经济特征等关键变量,并剔除部分回答缺失样本,最终获得全国2015年、2017年和2019年的1383个村庄样本观测值。

(二) 变量选择

1. 自变量。教育程度和企业经历是度量村干部能力的常见指标。但村干部学历对农户收入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9],仅仅依靠学历教育的人力资本要想真正在农村发挥作用是远远不够的^[10]。相较而言,从商经历这种特定类型的人力资本是在市场经营活动中历练获得的,代表了个人的综合素质。具有从商经历的村干部具有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双重身份属性,在治理行为上比普通村干部更注重经济效率^[11]。本文遂以从商经历作为村干部能力的标志,进一步将从商经历分为企业老板经历和个体户经历。村书记是村庄发展最核心的决策者与管理者,本文以村书记为研究对象。

2. 因变量。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下,制

度变迁伴随着外部资源进入激活村庄沉睡资源,建构起内生发展动能。本文以村庄收入衡量村庄总体经济状况,以集体资产收益表征村庄资源资本化情况。

3. 控制变量。村庄新内源式发展与村庄自身特征密切相关。其中,村域面积衡量村庄的自然边界与地理空间;通往县城道路数量表征村庄区位条件与交通状况;户籍人口数量表征村庄人力资源情况;60 岁以上的人口数量衡量村庄老龄化

程度;金融服务便利点表征村庄可利用的金融资源;村庄公约是村庄内生秩序的表现;党员是村庄新内源式发展的重要依托与政策落实的核心力量。村两委高学历人才越多越能集聚创新性想法为乡村振兴赋能。村书记个体特征也是影响村庄新内源式发展的重要变量。村书记自身教育程度表征其知识化水平;担任党支部书记的时间越长,信息流控制与资源配置能力越强^[12]。本文遂对如上变量予以控制,具体描述见表 1。

表 1 变量统计与描述

变量名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变量说明
Income	1 383	7. 652	5. 551	0. 095	16. 213	村庄总收入,取对数
Asset	1 383	3. 740	5. 106	0. 095	13. 998	村庄集体资产收益,取对数
Enterprise	1 383	0. 255	0. 520	0	2	村书记是否有从商经历:0 = 无;1 = 个体户 (Enterprise_1);2 = 企业老板 (Enterprise_2)
Education	1 383	4. 420	1. 311	1	8	村书记文化程度:1 = 小学及以下;2 = 小学;3 = 初中;4 = 高中 (职高);5 = 中专;6 = 大专;7 = 大学;8 = 研究生及以上
Time	1 383	8. 130	7. 349	1	46	村书记任职时长;年
Party	1 383	51. 578	33. 260	2	222	村庄党员数量;个
Highbedu	1 383	0. 170	0. 219	0	1	村两委高学历 (大专及以上学历) 比重
Rule	1 383	0. 860	0. 347	0	1	村庄公约:0 = 否;1 = 是
Num_older	1 383	380. 541	346. 798	0	3 000	村庄 60 岁以上户籍人数;人
Population	1 383	7. 330	0. 773	4. 543	9. 798	村庄户籍人口,取对数
Area	1 383	1. 883	1. 335	0	7. 695	村域面积;平方公里,取对数
Bank	1 383	0. 456	0. 727	0	5	村庄范围内金融服务网点数量;个
Road	1 383	2. 646	0. 808	1	5	村庄通往县城中心的道路:1 = 根本没有;2 = 一条;3 = 二条;4 = 三至五条;5 = 五条以上

(三)模型设定

为尽可能降低村庄和时间层面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减轻由遗漏变量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能人型村干部对村庄新内源式发展的影响,以期达到因果推断之目的。模型设定如下:

$$\ln Econ_{it} = \alpha_0 + \beta_i Enterprise_{it} + \sum \delta_i Z_{it} + \mu_i + \varphi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中, $\ln Econ_{it}$ 表示村庄 i 在 t 年的经济发展情况,分别用村庄总收入和村庄集体资产收益来衡量。 $Enterprise_{it}$ 表示村书记从商经历,以类别变量形式纳入模型。 Z_{it}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α 为截距项, β 、 δ 为待估系数, μ 为村庄固定效应, φ 为时间固定效应, ε 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对能人型村干部促进村庄新内源式发展的机制进行验证,模型形式为:

$$Mid_{it} = \alpha_1 + \beta_i Enterprise_{it} + \sum \delta_i Z_{it} + \mu_i + \varphi_t + \omega_{it} \quad (2)$$

$$\ln Econ_{it} = \alpha_2 + \beta_i Enterprise_{it} + \gamma_i Mid_{it} + \sum \delta_i Z_{it} + \mu_i + \varphi_t + \theta_{it} \quad (3)$$

式中, Mid_{it} 为中介变量,具体为政府扶持项目投入和村庄电商户数。 ω 和 θ 为随机扰动项,其他变量和待估系数与式(1)设定一致。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结果

表 2 为能人型村干部对村庄新内源式发展影响的实证结果。由列(1)和列(4)看出,能人型村干部对村庄新内源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具体的,与没有从商经历的村书记相比,有个体户经历和企业老板经历的村书记使村庄总收入分别提升了 95. 4% 和 332. 8%,有个体户经历的村书记对村庄集体资产收益的影响不显著,有企业老板经历的村书记使村庄集体资产收益提升了 371. 6%。

列(2)和列(5)将村书记个体特征纳入模型,结果表明,有个体户经历和企业老板经历的村书记对村庄总收入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有企业老板经历的村书记对村庄集体资产收益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村书记学历越高,越能够促进村庄收入增长和集体资产收益增加。列(3)和列(6)进一步将村庄特征变量纳入模型。结果表明,有个体户经历和企业老板经历的村书记对村庄总收入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有企业老板经历的村书记对村庄集体资产收益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假说 H1 得证。具有从商经历的能人型村干部能够将其经营理念和管理经验应用于村庄发展,依托突出的个人能力推动资源变成资产,以及通过变革发展模式与创新经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村庄发展与村民增收^[13]。

表 2 能人型村干部对村庄新内源式发展的影响

变量	(1) Income	(2) Income	(3) Income	(4) Asset	(5) Asset	(6) Asset
以无从商经历的村书记为参照						
Enterprise_1	0.719 * (0.389)	0.737 * (0.390)	0.668 * (0.387)	0.164 (0.374)	0.194 (0.377)	0.122 (0.368)
Enterprise_2	1.592 ** (0.779)	1.498 ** (0.775)	1.216 * (0.737)	1.735 ** (0.769)	1.619 ** (0.786)	1.316 * (0.774)
Education	—	0.393 *** (0.122)	0.097 (0.131)	—	0.469 *** (0.107)	0.205 * (0.115)
Time	—	0.011 (0.021)	0.006 (0.020)	—	0.015 (0.020)	0.011 (0.019)
Party	—	—	0.010 (0.008)	—	—	0.014 ** (0.008)
Higheedu	—	—	2.928 *** (0.782)	—	—	2.831 *** (0.768)
Rule	—	—	1.311 *** (0.436)	—	—	0.845 ** (0.362)
Num_older	—	—	0.000 (0.001)	—	—	0.000 (0.001)
Population	—	—	-0.086 (0.325)	—	—	-0.387 (0.311)
Area	—	—	0.111 (0.119)	—	—	0.061 (0.113)
Bank	—	—	0.873 *** (0.195)	—	—	0.726 *** (0.191)
Road	—	—	0.138 (0.196)	—	—	0.309 * (0.177)
村庄 固定效应	✓	✓	✓	✓	✓	✓
时间 固定效应	✓	✓	✓	✓	✓	✓
Obs.	1 383	1 383	1 383	1 383	1 383	1 383
R ²	0.010 3	0.022 1	0.073 0	0.032 5	0.049 3	0.098 7

注:括号内为村庄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p < 0.01$ 、 $p < 0.05$ 、 $p < 0.1$ 时有统计学意义。下同。

从村庄特征来看,金融服务点对村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延伸到村的金融服务打通了普惠金融的“最后一公里”,便利的融资环境也

能够为村庄发展先期“输血”,进而通过资源开发、产业发展等方式实现自我“造血”。村庄公约对村庄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村规民约在激发农民主动性、主体性作用的同时,有助于在村集体层面达成统一发展意愿。通往县城的道路对集体资产收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区位和交通占优的村庄有利于资源下乡与农产品进城,更易承接城市产业转移,增加集体资产收益。村庄党员在政策贯彻、产业引领、发展带动、社区帮扶等方面具有先锋模范作用,对集体资产收益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村两委成员中高学历成员占比越高,越能促进村庄总收入和集体资产收益增加。高学历人才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学习能力更强,能够更好地掌握现代技术、科技、市场等,进而促进集体经济发展。

(二)稳健性检验

个人成长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个体的发展思维、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村庄经济发展对个体的工作经历具有重要且显著的影响。在本文中,村干部从商是过去事件,村庄发展是当前情况,在时间上不具有反向因果关系。同时,本文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避免了截面数据的内生性问题,但仍有必要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首先,变换自变量。将三分类变量转为二分类变量(Enterprise),即如果村书记具有个体户经历或企业老板经历,就对其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有从商经历的村书记对村庄总收入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对村庄集体资产收益具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这说明有从商经历的能人型村干部能够提升村庄整体经济水平,但其对村庄发展更深层次的影响需结合其具体从商经历做进一步分析^①。其次,变换因变量。以村庄人均收入(Income_per)和人均集体资产收益(Asset_per)作为因变量。实证结果显示,有个体户经历和企业老板经历的村书记对村庄人均收入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有企业老板经历的村书记

① 当然,通过放松限定条件,对其他变量不予控制的情况下,实证得出有从商经历的村书记对村庄总收入和集体资产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

对村庄人均集体资产收益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最后,变换模型。不考虑固定效应的问题,直接使用 OLS 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同样稳健。由此进一步证实,具有从商经历的能人型村干部对村庄新内源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从表 2 和表 3 看出,有个体户经历的村书记对村庄集体资产收益的提升效果不显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个体户和企业两类创业行为存在差异。个体户是基于当地资源的就地化创业行为,具有接地气、门槛低、投入少、技术难度低、风险小、易复制推广等特征。村干部能够凭借个体户经历积累的能力与经验推动村庄经营创新,在短时间内产生效果,由此提升村庄收入水平。而企业老板经历所积累的企业管理经验能够推动村庄整体性、深层次、大范围的发展变革。尤其是随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进,产权明晰化激励市场资源进入,村庄内外部力量融合推动资源变资产,提升集体资产收益。

表 3 稳健性检验

变量	变换 X		变换 Y		变换模型	
	Income	Asset	Income_per	Asset_per	Income	Asset
Enterprise	0.845 ** (0.376)	0.453 (0.356)	—	—	—	—
Enterprise_1	—	—	0.307 * (0.174)	0.071 (0.137)	0.679 * (0.406)	0.306 (0.378)
Enterprise_2	—	—	0.733 ** (0.360)	0.596 ** (0.316)	1.532 *** (0.733)	1.521 * (0.789)
控制变量	√	√	√	√	√	√
村庄 固定效应	√	√	√	√	—	—
时间 固定效应	√	√	√	√	—	—
Obs.	1 383	1 383	1 383	1 383	1 383	1 383
R ²	0.072 6	0.097 1	0.085 8	0.092 8	0.070 8	0.083 1

五、影响机制分析

(一)“外引”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向农村投入的资源规模达到空前。现以村庄承接的政府项目投入(取对数)(*Program _gov*)作为中介变量,分析能人型村干部何以获得政府支持,并以此推动村庄新内源式发展。

从表 4 看出,与没有从商经历的村书记相比,具有企业老板经历的村书记能够获得更多政府项目帮扶。具有企业老板经历的能人型村干部了解更多政策信息,对村庄发展有更长远、清晰的规划,能够抢抓机遇引进村庄发展所需的项目资源。同时,能人型村干部在村庄具有较高权威,可有效

动员村民参与村庄集体行动,有助于推动政府项目实施。此外,能人型村干部能够依托自身经营能力妥善解决项目运营问题,有助于获得更多政府项目支持。

表 4 实证结果还表明,政府项目投入能够显著促进村庄总收入和村庄集体资产收益,且政府项目投入在具有企业老板经历的能人型村干部提升村庄总收入和村庄集体资产收益中具有中介效应。政府项目具有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能够解决村庄发展短板。政府项目还具有孵化作用,能够吸引更多资源进入村庄,内外资源结合将有力促进村庄新内源式发展。假说 H2 得证。

表 4 “外引”机制

变量	(1)	(2)	(3)
	Program _gov	Income	Asset
Enterprise_1	0.012 (0.045)	0.634 (0.385)	0.110 (0.369)
Enterprise_2	0.192 ** (0.086)	0.914 (0.739)	1.100 (0.777)
Program _gov	—	0.908 *** (0.240)	0.562 *** (0.219)
控制变量	√	√	√
村庄固定效应	√	√	√
时间固定效应	√	√	√
Obs.	1 373	1 373	1 373
R ²	0.074 3	0.084 6	0.102 1

(二)“内联”机制

电子商务是互联网催生的新兴产业形态,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具体表现。现以村庄从事电子商务的农户数量(取对数)(*E - commerce*)为中介变量,实证分析能人型村干部何以推动村庄经营创新,以及如何进一步影响村庄新内源式发展。

由表 5 看出,具有个体户经历的能人型村干部能够显著促进村庄电子商务发展。能人型村干部对电子商务更加熟悉,能够将村民组织起来培训,也可以自己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帮助村民掌握电商知识。同时,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村庄总收入和集体资产净收益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电商户数在具有个体户经历的能人型村干部促进村庄总收入提升中具有中介效应。电子商务给农产品营销带来颠覆性变革,减少了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拓宽了市场范围。电子商务还具有极大的外部

性,尤其是网商的群聚能够创造巨大的外部经济,进而对产业绩效产生重要促进作用。而且村庄电子商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能够从量变产生质变,电子商务集聚发展形成的淘宝村、淘宝镇蕴含着社会创新,包括农户个体间的知识溢出和集体组织的创新^[14]。能够有力促进村庄新内源式发展。假说 H3 得证。

表 5 “内联”机制

变量	(1)	(2)	(3)
	E-commerce	Income	Asset
<i>Enterprise_1</i>	0.364 *** (0.111)	0.138 (0.477)	-0.124 (0.442)
<i>Enterprise_2</i>	0.246 (0.209)	1.824 ** (0.793)	2.012 ** (0.921)
<i>E-commerce</i>	—	0.442 *** (0.151)	0.632 *** (0.155)
控制变量	√	√	√
村庄固定效应	√	√	√
时间固定效应	√	√	√
<i>Obs.</i>	919	919	919
<i>R</i> ²	0.061 7	0.072 6	0.110 1

六、异质性分析

在不同治理结构的村庄,村干部所发挥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以“一肩挑”和宗族作为村庄治理结构的分类变量,进一步探讨能人型村干部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环境中对村庄新内源式发展的影响。

(一)“一肩挑”

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在任职中由于权责不清和利益纠葛等原因出现不同程度的彼此推诿、对着干、相互扯皮等矛盾,产生村民自治组织功能缺位、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落实遇到“梗阻”、干群关系紧张“离心”等问题^[15]。“一肩挑”指村民委员会党支部书记和村民委员会主任由一个人同时担任,该制度的设计初衷是解决村两委矛盾,通过统一主体,将权责与职能压实到一个人身上,以此提升村干部的工作能力、提高办事效率,也借此减少基层干部的数量,减轻农民负担等^[16]。

由表 6 看出,在非“一肩挑”的村庄,具有企业老板经历的能人型村干部对村庄总收入、集体资产收益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在实行“一肩挑”的村庄,能人型村干部对村庄新内源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由此说明,从村庄经济发展角度,村书记、

主任“一肩挑”限制了具有企业老板经历的能人型村干部企业家才能发挥作用。尽管“一肩挑”解决了村级治理主体职能分工、权责分配等问题,但这一制度对村干部的能力与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肩挑”之后的村书记既要懂政治、又要懂管理、还要懂经济,现实中存在人才不足、能力不济、威望不高、监督不力、民意不达等难题^[15]。“一肩挑”情形下村书记需要花费更多精力处理村务,尤其是村庄治理呈现明显行政化倾向的情形下,更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谋划发展。另外,权力的集中可能导致村书记拥权自重,降低主动作为的积极性,甚至导致监督困难与腐败频发,对村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表 6 “一肩挑”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是 Income	否 Income	是 Asset	否 Asset
<i>Enterprise_1</i>	-0.108 (0.728)	1.021 ** (0.481)	-0.708 (0.648)	0.282 (0.464)
<i>Enterprise_2</i>	-0.213 (1.413)	1.894 ** (0.883)	0.541 (1.281)	1.926 ** (0.935)
控制变量	√	√	√	√
村庄固定效应	√	√	√	√
时间固定效应	√	√	√	√
<i>Obs.</i>	455	927	455	927
<i>R</i> ²	0.061 1	0.089 0	0.072 2	0.119 7

(二)宗族

对于村干部而言,宗族是村庄发展中的重要助力,能够依托宗族力量,将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结合起来强化其在村庄的影响力。同时,宗族加强了村民的集体行动能力,而这种集体行动能力的加强,可以迫使村干部在决策中满足村民的意愿,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17]。当宗族领袖与村庄领导者耦合时村两委更容易凝聚人心,也更容易受到非正规群体的监督和惩罚。本文采用“村庄是否有大姓”作为宗族的代理指标,村庄存在大姓通常代表有相对较强的宗族网络,且大姓比例越高,宗族强度就越强。

由表 7 看出,在没有宗族的村庄,具有企业老板经历的能人型村干部对村庄总收入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对村庄集体资产收益的影响不显著。在有宗族的村庄,具有个体户经历的能人型村干部对村庄总收入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具有企业老板

经历的能人型村干部对集体资产收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村庄总收入的促进作用变得不显著。宗族这种非正式制度限制了具有企业老板经历的能人型村干部对村庄收入的提升作用。在一个多元行动者共存的村落中,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一方面,宗族能够对村干部提供互补性支持,能够更便利地进行村庄动员,促进村庄发展。另一方面,宗族作为村民公共需要的一种非正式的组织选择,对正式民主组织具有显著的替代作用,会限制基层民主的实质内涵,以及影响村干部自身作用发挥^[18],进而对村庄发展产生抑制作用。

表 7 宗族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是 Income	否 Income	是 Asset	否 Asset
Enterprise_1	0.805 ** (0.410)	-1.017 (1.086)	0.251 (0.398)	-1.008 (0.887)
Enterprise_2	0.876 (0.835)	3.454 *** (1.158)	1.622 ** (0.743)	0.897 (1.677)
控制变量	√	√	√	√
村庄固定效应	√	√	√	√
时间固定效应	√	√	√	√
Obs.	1 103	279	1 103	279
R ²	0.064 0	0.193 5	0.097 3	0.172 3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村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能人型村干部对村庄新内源式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具有个体户经历的村书记对村庄总收入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具有企业老板经历的村书记对村庄总收入和集体资产收益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政府支持与经营创新是能人型村干部促进村庄新内源式发展的重要机制。基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实行“一肩挑”的村庄,具有从商经历的村书记对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再显著,“一肩挑”对村级组织负责人的能力与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且权力的集中可能降低村书记主动作为的积极性与带来监督困难,进而对村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有宗族的村庄,具有企业老板经历的村书记对村庄总收入的提升作用不再显著,宗族对正式民主组织具有显著的替代作用,会限制基层民主的

实质内涵,以及影响村干部自身作用发挥。

尽管有从商经历的能人型村干部对村庄新内源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能人型村干部治村可能引致的“意外性”后果需重视和防范。一些具有从商经历的能人当选村干部后,将村庄作为整体进行经营,可能由此引发村级治理的巨大转变。能人型村干部的经营行为使得治村目标脱嵌于村庄实际需求,导致村庄治理陷入发展主义陷阱。尤其在项目进村背景下,能人型村干部经营村庄的面向日益凸显,其以企业化思维运作公共财政项目,与部分村民建立“权力-利益”网络,干群之间的互动呈现差异化和圈层化特征,将极大稀释村庄治理的政治性和公共性^[19]。

(二) 政策建议

第一,多措并举激励能人返乡创业。一是建立常规的人才联络机制,保持与在外创业人员之间的日常联络,及时解决他们的关切、疑问、顾虑;二是通过人情关怀打动能人,激发他们返乡创业造福家乡的意愿。

第二,为能人创业创新提供切实保障。一是鼓励能人担任经济组织负责人,对内进行产业布局,对外对接广泛市场,带动村庄集体经济发展;二是强化基础保障,如通水通电通路等,建立良好的发展基础,尤其要解决好“最后一公里”问题;三是加大对能人产业政策、帮扶项目的支持,以政府资源撬动更多社会资源参与村庄发展。

第三,强化村两委班子建设,发挥好基层党组织在村庄事务中的全面领导作用。一是完善村干部公开选拔、任前公示制度,把好村干部“入口”关;二是建立对村干部的定期培训制度,加强对政策文件和经营管理知识的学习,提升村干部的经营管理能力。

第四,完善基层治理制度,规避制度潜在的不利影响。一是完善村级事务民主决策机制,重大事项经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二是加强对村集体财务的民主监督,做到财务公开与阳光运作;三是完善村干部勤廉评议制度,村干部自觉接受党员和村民监督评议;四是因地制宜积极推行村书记、主任“一肩挑”,并完善村务公开与权力监督制

度;五是发挥好宗族在村庄事务中的积极作用,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群众性自组织建设。

参考文献:

- [1]杨慧莲,韩旭东,李艳,等.“小、散、乱”的农村如何实现乡村振兴:基于贵州省六盘水市舍烹村案例[J].中国软科学,2018(11):148-162.
- [2]李怀瑞,邓国胜.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新内源发展路径研究:基于四个个案的比较[J].中国行政管理,2021(5):15-22.
- [3]马荟,庞欣,奚云霄,等.熟人社会、村庄动员与内源式发展: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20(3):28-41.
- [4]朱娅,李明.乡村振兴的新内源性发展模式探析[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9(6):124-130.
- [5]张环宙,黄超超,周永广.内生式发展模式研究综述[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61-68.
- [6]张文明,章志敏.资源·参与·认同: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J].社会科学,2018(11):75-85.
- [7]岳晓文旭,王晓飞,韩旭东,等.赋权实践如何促进乡村新内源发展:基于赋权理论的多案例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22(5):36-54.
- [8]KOSFELD M. The role of leaders in inducing and maintaining cooperation: the CC strategy[J].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020,31(3):1-11.
- [9]赵仁杰,何爱平.村干部素质、基层民主与农民收入:基于CHIPS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16(2):129-152.
- [10]高梦滔,毕岚岚.村干部知识化与年轻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9(7):77-84.
- [11]曾建霞,杨锦秀,廖开妍.富人治村能实现“先富带动后富”吗?:基于四川省867个村庄的实证分析[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0,19(6):769-778.
- [12]杨婵,贺小刚.村长权威与村落发展:基于中国千村调查的数据分析[J].管理世界,2019,35(4):90-108.
- [13]ADAMS R, KELOHARJU M, KNÜPFER S. Are CEOs born leaders? lessons from traits of a million individual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8,130(2):392-408.
- [14]CUI M, PAN S L, NEWELL S, et al. Strategy, resource orchestration and e-commerce enabled social innovation in rural China[J].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2017,26(1):3-21.
- [15]陈军亚.农村基层组织“一肩挑”的制度优势与现实障碍[J].人民论坛,2019(11):99-101.
- [16]文丰安.村民自治的逻辑困境与基层党内民主建设的关系研究[J].科学社会主义,2012(1):92-95.
- [17]齐秀琳,伍骏骞.宗族、集体行动与村庄公共品供给:基于全国“十县百村”的调研数据[J].农业技术经济,2015(12):117-125.
- [18]孙秀林.华南的村治与宗族:一个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J].社会学研究,2011,25(1):133-166.
- [19]崔盼盼,桂华.“能人治村”与经营村庄: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干部行为研究[J].地方治理研究,2022(4):64-76.

(本文责编:王延芳)